

钱鍾书研究丛书



真精神与旧途径

——钱鍾书的人文思想

钱鍾书研究丛书

真精神与旧途径

——钱鍾书的人文思想

胡河清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钱鍾书研究丛书
真精神与旧途径
——钱鍾书的人文思想
胡河清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6.25 印张 135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7.80 元
ISBN 7-5434-2281-6/G · 1903

缘 起

钱鍾书先生是我国当代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作家，有“文化昆仑”、“一代鸿儒”之誉。其著作博大精深，融贯古今中外，被视为人类文化中具有经典性的巨著。“钱鍾书研究”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普遍的重视。“钱学”正方兴未艾。

为全面系统地展现近年来钱学研究的成果，亦为今后的钱学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们决定编辑出版《钱鍾书研究丛书》（系列）。

《钱鍾书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的天地，它以容百家之言、促学术交流为己任，以反映钱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总体面貌、推动钱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目的。它是所有钱学研究者的园地。

我们期望此套丛书的出版，能使目前的钱学研究再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五月

F-J16/20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钱鍾书的天命批判.....	(4)
第二章 钱鍾书的智慧风貌.....	(15)
第三章 钱鍾书与中国传统艺术境界.....	(39)
第四章 钱鍾书与现代西学.....	(62)
第五章 钱鍾书语言研究的当代文化意义.....	(77)
第六章 钱鍾书的文章家法.....	(98)
第七章 钱鍾书论史.....	(112)
第八章 钱鍾书的学术渊源举要.....	(139)
第九章 钱鍾书的小说创作.....	(156)
结语.....	(171)
附录：杨绛论.....	(174)
后记.....	(192)

引 言

在献上这部小书时，我心中的忐忑不安是前所未有的。本书的宗旨，确乎是试图揭示钱鍾书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的复杂心态，并对钱鍾书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独特地位作出评价。然钱鍾书先生之阅历高深，学术宏富，浅学之人如我者，欲穷观极照，不亦难乎！

主要有鉴于此，我主观上倒是想力求避免作浮泛之论必然带来的空疏之弊。于是仅取钱鍾书的几个重要的思想、学术问题加以纵深发掘。当然也希望由此以点带面，识小而大通。

王安石曾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钱鍾书的学术、人格，实乃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我愿以毕生之心力精力求渐悟之。我之所以现在就选择这一论题，也有一种立志自誓之意。

钱鍾书先生说：“余尝谓海通以还，天涯邻比亦五十许年，而大邑上庠尚有黽生曲儒未老先朽，于外域之舟车器物乐用而不厌，独至行文论学，则西来之要言妙道绝之惟恐不甚，假信而好古之名，以抱残守阙自安于井蛙禿虱，是何重货利而轻义理哉！盖未读李斯《谏逐客书》也。其欲推陈言以出新意者，则又鲁莽灭裂，才若黄公度，只解铺比欧故，以炫乡里，于西方

文学兴象意境概乎未闻，此皆眼中之金属，非水中之盐味，所谓为者败之者也。譬如啖鱼肉，正当融为津液，使异物与我同体，生肌补气，殊功合效，岂可横梗胸中，哇而出之，药转而暴下焉，以夸示己之未尝蔬食乎哉！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①

此节文字，既反映了钱锺书对于融会、吸收西方文学兴象意境的纲领性意见，又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对于钱氏的影响之深。中国传统文化之吸收外来之学，大抵先用内证功夫静观默察体悟之，然后化为自己的心性之学。此即钱锺书先生“故必深造熟思，化书卷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之谓也。

故读钱锺书先生之书，亦必先体味其神理，钻研既深，始能想见先生之为人，至此境域，则渐于先生之深文隐旨彻矣。

用现代的术语说，也就是必须通过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对钱著的真精神有所体认之意。这当然也是本书力求达到的基本目标之一。

古今贤哲，其思想、人格绝无矛盾者亦罕矣。唯因矛盾复杂，故成其大，故遂其深。钱锺书先生也是如此。综观钱锺书的基本学术主张，乃在调和中西文化，臻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②之境。然平心而论，中西文化的渊源流变既大异，欲达斯旨，诚难矣哉。达识通人如钱锺书先生者，其力图融贯中西学术之大论，固不乏独造精微之见；然究其始终，则仍有自相矛盾之处。即如本书大要所示，钱氏讥谤天命，得乎希伯莱文化狂言诟天之生命激情，又其智慧风貌，颇与德国古典文化之精义相冥契，此皆西学之要谛；而钱氏之人生修炼，则深得庄学游心之谛之三昧，以虚无淡泊养气致静

为宗，终归乎中国传统艺术之极境。故质实言之，则钱氏灵府之中，中学西学，恰如奇峰对峙，而未泯道术之裂矣。

凡此种钱鍾书思想、人格上的矛盾之点，本书不仅不回避，而且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试图通过研究这些矛盾现象，进一步加深对于钱鍾书真实性格的认识。

此书仅为起步之作，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谨望方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我虽才疏学浅，于《易》“修辞立诚”之教则不敢有违。凡读钱鍾书先生之书及各种钱学研究著作中所觉疑难，均不敢私自隐匿。对于钱鍾书学术上的不足之处，也不讳言。因思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要皆忠于学术即忠于先生也。眷眷此心，又必为各位前辈所明鉴也。

《周易》以“乾”卦为首，申中国传统学术深究天人之大义。今此书亦以对钱鍾书的天命批判之论析开篇，实思前贤之迹，以发愤自励也。

注释：

- ① 郑朝宗《续怀旧》，《随笔》1987年第2期。
- ② 钱鍾书《谈艺录》第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一章 钱鍾书的天命批判

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被某些学者称为“理性主义”的儒学中，是一占有极重要地位的精神范畴。孔夫子虽然声称“不语怪力乱神”，却又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孔子曾作易传之说目前已不为学者所普遍接受，但他对《周易》有精深的研究则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逮至汉世，大儒董仲舒创“天人合一”之说，将儒学中原有的隐晦的天命观念与道家、阴阳家特别是历代对《周易》研究的哲学成果结合起来。此说经过数千年之演进，堪称博大宏深。这一体系在传统治学中又被称之为“纬学”或“内学”。与儒学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为主体的“经学”互为表里。

值得注意的是，降及现代，尤其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纬学体系的思想似乎显示了比经学体系的思想更为强韧的生命力。对传统经学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正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诸先生，却皆仍笃信传统之天命观念。梁氏曾在他的思想自传《人心与人生》中对儒学之天命信仰颇表首肯。熊十力先生对神秘宗更有深湛的体会。如《佛家名相通释》云：“然世间说梦，多有灵异，如预兆休咎与幽灵等事，有不能尽以变态心理言之者，姑存疑焉可也。”^①以下还现身说法，以证此理。钱穆先生也在近著中多次提及特异功能、命相堪舆

之学，颇有默许之意。

作为一种有数千年之悠久历史，且沉淀了如许哲人智者极高深的精神体验的古老文化，中国神秘宗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魅力。河图洛书，易之六爻，象数之变，深不可测。史言汉之京房、唐之李淳风、宋之邵康节、明之刘伯温、皆知阴阳，察乎天变，世称奇士。

然而现代中国有一位老人，他也是从浩如烟海的古典秘藏中一步步走过来的，而且学识之渊深丝毫不让古人，却对着这个据称传自河图洛书的“彼岸世界”发出了一阵尖刻的冷笑。这位老人就是钱锺书先生。

唐李淳风之《推背图》，世传为预示朝代兴亡更替之神谶。其实星气谶纬之学由来已久。钱氏对《推背图》之验否未作明确之表态，但观其引宋岳珂“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学益炽”^②之说并屡加称许，可知钱氏主要是从历史心理学的观点看待此书的价值的。此下又云：“西汉图谶有‘代汉者当涂高’之语，《后汉书·公孙述传》载光武帝与述书，嘲之曰：‘君岂高之身邪？’；下至东汉之末，袁术又自谓应‘当涂高’之谶，李云则谓应此谶者为曹魏。更下至西晋之末，王浚犹‘以父字“处道”，为“当涂高”，应王者之谶，谋将僭号’（《晋书·王浚传》）。解因人而异，释随心所欲，各以为代兴张本，即所谓‘人有倖心’也。”^③大凡图谶之学，词语多深曲隐晦，可作多义解，故真假难辨，常被野心家托为口实。钱氏对此的讥讽之意已见乎言外耳。钱锺书论曰：“当代一法国文家，惜忘其名，尝曰：‘有史以来，世人心胸中即为梦想三端所蟠据：飞行也，预知未来也，长生不死也’。图谶既可逞预知未来之痴想，复得称‘王侯崛起’之倖心，宜其如春草

之火烧不尽而风吹复茁耳”。^④则已直斥“预知未来”为“痴想”了。

钱锺书又说：“汉世依附讖纬可言休咎之舞文，入宋而自立门户，与龟策、星命、风水分庭并峙，几若妖妄术数之四岳焉。”^⑤至此其对传统纬学持彻底决绝的批判态度明矣。

钱锺书对天命之说的批判，是他的独特的人生观宇宙观的重要构成因素，并且对他的艺术创作构成了微妙的影响。又由于钱氏学殖渊深，兼通国学西学，故他的天命批判，其中也不乏独创性之卓识。

我认为，钱氏批判天命之说，其重要渊源之一乃出于中国传统史学。传统史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便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于中国封建政治内幕太黑暗了，太冷酷无情了，因此不得不使大量接触第一手资料的史家们从很早起便怀疑是否有善良公正的最高神祇存在。司马迁对此便发出了语调沉痛的质疑：“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⑥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引述司马迁此段议论后说：“马迁牢愁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⑦正是指出司马迁的怀疑来自他对封建政治的残酷性的切身感受。

然而钱锺书也看到，司马迁对于有意志的“天”的批判并不是彻底的：“马迁唯不信‘天道’，故好言‘天命’；盖信有天命，即疑无天道，曰天命不可知者，乃谓天道无知尔。”^⑧的确，在《史记》对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律的探究中，司马迁并没有摆脱传统天命观的影响，他经常将战争的胜负与王朝的兴衰归之于天意。故钱氏又谓：“盖析理固疑天道之为无，而慰情宁信阴

鹭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欤。”^⑨

认为司马迁之信阴鹭实出于“慰情”的动机，是钱锺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钱锺书在评论《诗经·四月》“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句时也有一段表现类似思想的文字：“《笺》：‘我先祖匪人乎？人则当知患难，何为曾使我当此乱世乎？’；《正义》：‘人困则反本，穷则告亲，故言‘我先祖匪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则由怨言进而为怒骂，诟及己之祖宗，恨毒更过于《正月》、《小弁》，大类《旧约全书》中先知咒骂己之诞生、母之孕育等。儒生尊《经》而懦，掩耳不敢闻斯悖逆之言，或解为：‘先祖不以我为人乎’？或解为：‘先祖乎？我独非人乎’？或解‘匪人’为‘彼人’、为‘非他人’，为‘不以人意相慰恤’，苦心曲说，以维持‘《诗》教’之‘温柔敦厚’。”^⑩

在此，钱锺书击中了儒教理想人格的一大致命弱点——缺乏孤行独立的自在自为的意志力量和精神信仰。“温柔敦厚”，实出于“畏”也。这与释儒家之“儒”的本义为柔弱、懦弱之说，颇有相近之处。儒家的“礼”重视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人格，“孝”强调对家庭父母的依赖。当儒学的价值导向在历史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教义时，便在深层结构上影响并制约了封建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模式。儒生虽然经常具有忠厚善良的品德，却不敢承认生命的美丽，不敢闻粗野骇人的悖慢之言。他们遵循《周易》老于世故的人生教诲过日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将生命冲动压抑到将近于零的水平，变成一种谨小慎微的灰色人。这样的人即使对于命运的不公感到抑郁难伸，但对于可能存在于幽冥之中的无上主宰依然在本质上是畏惧的。儒生拘谨的根性使他们不可能成为狂热的宗教徒，但他们也决不敢彻底得罪上帝。故特多自相矛盾之论。司马迁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

中已属胆识尤为卓特者，尚且不能免俗，可见“慰情”作为一种心理陋习的根深难除。

所以，钱锺书在前面引述的文字中提到《旧约全书》，尤其值得注意。《旧约》之上帝耶和华，性情颇与《新约》之主神圣母玛丽亚耶稣基督相异，前者暴烈易怒，后者温良纯洁。耶和华又称万军之神，动辄降血光之灾于人世。为古希伯莱先民的强悍气质之化身。而《旧约》中诸先和前贤，也都桀傲不驯非孔教中人之可比。即使对上苍信仰坚定如约伯者，身罹厄难之际，也竟腾目高视，大放悖逆之言。

在此意义上，钱氏之讥天命，又特有与《旧约》精神相通处。如谓：“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卷二八《天说》：‘我悲夫天有权而不能用力也！我悲夫天有其盛心而辄失也！柳宗元以为天无所用心，太过’；则谓天有知而无能，有心而无力，行与愿乖，故不怨之恨之，而悲之悯之，更下一转，益凄挚矣。有哲学家谓人之天良不能左右人之志事，乃‘无能为力之无上权力’；其语可借以形容陈氏之‘天’。讥‘老天爷’耳聩目耗，又似当世西人所谓‘聋子上帝’；‘失聪失明，不死永生’。古罗马大诗人尝咏‘天高复清静，无虑无为，超然物外，勿顾人世间事’。则宋词中惯语‘天不管’（黄庭坚《河传》、朱淑真《谒金门》等），可断章隐括。”^①虽则借用了不少中国旧籍中的词句，而钱锺书此处表现的精神气质，却是旧学传统中极罕见的东西。大有《旧约·约伯记》狂言诟天之风。

宗教所反映的无非是对人类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特殊体察。《旧约》则有正视人生惨淡真相的勇力。这一古希伯莱文化的精髓，对后世西方文化中“摩罗诗力”之形成影响至为深巨。罗曼·罗兰曾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对《旧约》倍加推崇，

认为此书中有刚健不挠的反抗命运之力，斯言良然。考之历史，则歌德的《浮士德》中，默许魔鬼诱使浮士德老博士走出中世纪的书斋者，正是一酷似耶和华之男性上帝。哥德称：“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一个想要同另一个分离。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别一个是猛烈地要离凡尘，向崇高的灵的境地飞驰。”^⑩此乃西方近代文学中辩证观察之先声。意谓神性与魔性本为一体，生命的美丽与罪恶携手而行。至此方将《旧约》的本义阐发齐全。至于英国弥尔顿之撒旦，美国麦尔维尔之哈阿船长，悉为魔界中人；然其精神气魄之伟大，又都有上帝的影子在。其间之奥秘，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作家秉承了《旧约》弘扬生命意志的传统。

钱鍾书论及麦尔维尔《白鲸记》（又译《莫比·迪克》）时说：“美国名小说《捕鲸记》有一章专论白色，谓人物之白者虽足贵惜，然亦复正缘色白而更可憎恶，如天老儿是……”^⑪

此处钱氏又发一谑天之语也。《白鲸记》的主人公哈阿船长，为戕杀一条不可能杀死的大白鲸而穷其一生。最后孤注一掷，终于葬身鱼腹。按西方文学研究者的公允之论，斯白鲸者，天命不可移之象征也，“天老儿”之变体也。哈阿船长以区区七尺血肉之躯，敢向不可战胜之命运发难如此，折戟沉沙系其必然下场。但他的伟大意志力，又因此超越庸愚，进入永恒。麦尔维尔喻哈阿为“雄性的海”，语云：“The strong troubled, murderous thinkings of the masculine sea”（雄性的海强烈、焦躁、充满杀机的思想）^⑫。此语适极符合《旧约》主神耶和华的性情。故自西方近代文学的辩证观察看，则哈阿实一神魔之性兼具之人。

钱氏之称道《白鲸记》，直言“天老儿”之“可憎”，大抵为其心与哈阿船长有戚戚之流露也。此上承《旧约》咒诅天地

之先民遗风，下赋西方近代文学摩罗诗力之革命反抗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确是别具一格的声音。

钱锺书天命批判的另一渊源，当属罗马希腊文化系统中的尚武精神传统及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钱氏曾说：“西方旧日论师亦言，武功既致太平，人遂得闲而尚学文，于是壮心勇力为书卷所消磨。故古罗马文雅渐进，雄猛随减，凡好斗善战之国，其人皆犷野不学；法国不血刃而克意两邦，以意之君臣竞才学而不倡勇敢也。”^⑤他在此总结古罗马帝国的衰亡等历史教训时，归之于“雄猛随减”，已经表露了对于“武功”的崇尚。在别一处论述中，钱锺书对此有更明确的阐发：“古罗马人早谓两军相斗，‘上帝佑其强有力者’，‘天神喜得胜之人’，即谓其不扶弱而反助强。后世递相祖述，至云：‘至善之上帝有一恶习：即常在军队强大者一边。’”^⑥由此可见，在钱氏看来，“天命”也者，实不过是“实力”的别名而已。此说又谓“力命”说，在崇尚武功的古罗马古希腊即开先河。逮至文艺复兴时代之欧洲，奸雄逐鹿，物竞天择海阔天空；思想解放，理性主义全面勃兴，“力命”之说终于大盛。集此说之大成者，即西方政治哲学之先驱、《霸主论》作者马基雅弗利也。而钱氏著作中恰一再提到马基雅弗利，如谓：“西土则马基亚伟利尤好言‘力命之对比’”^⑦，足证他的思想之所自。

钱锺书倡此“力命”之说，实是有针对性的。近百年以来，严复译《天演论》申物竞天择之义，鲁迅作《斯巴达之魂》力图改变国民的精神，都是以忧患深重的“危言”作为立论的前提的。在此意义上，钱氏对“天命”、“力命”两说的抑扬取舍，其间有深虑存焉。

我认为，从历史的尺度看，确实应该对钱锺书的天命批判

予以较高的评价。吴汝纶曰：“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业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⑩吴氏此说，即洞察到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本质分野所在：一主任天为治，一主以人持天。传统的天命观，任天为治的理论基础也。在此意义上说，钱锺书的力命说，倒是接近于“以人持天”的价值体系的。特别是钱氏指出传统纬学与封建时代的依赖性人格的关系，为前人之未发。同时，钱锺书的立论又是在进行了具有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内涵还是比较丰富的。

当然，终极存在的问题的哲学本质是极其复杂的。钱锺书的天命批判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结论。

我认为，钱锺书的天命批判的局限性之一，是他的看法有时流于绝对化。比如他指出传统纬学的糟粕部分的荒诞性，某些儒生出于“慰情”之动机而敬奉天命，都是确的；但他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对于神秘的不可知的事物的向往是人类科学文化前进的一个极其深刻的内驱力。即使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我也主张将“学究天人”的精神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纬学分离开来，前者对于人类文化是具有永恒性的精神价值的。

在哲学、科学的领域内讨论这些问题，限于学力，非作者之所能胜任。但我想指出的是，严格的理性主义批判尽管可以在历史的座标上占有卓越的地位，但由于其对神秘性的绝对否定，往往却给艺术创作的王国带来不利的影响。

从世界文学史看，一个民族最杰出的艺术代表恰恰常是一些对于人生怀有神秘感觉的人物。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伟大，乃在于他们的作品中有着一一种预言家的力量，使人在宗教般高深的层次上对俄罗斯民族之悲苦命运与远大前程，产生洞察。中国的伟大小说家曹雪芹，虽然是礼教思想的叛逆，却仍然将天人之学的意蕴贯彻于他那美丽的人生之谜的始终。这也并没有削弱《红楼梦》的深刻性。反之，这部小说具有先知的份量已为历史所证实。

《周易》中有“咸”卦，其义为“感”，意谓存在一种超凡的心灵感应能力。而我认为，神秘宗所以常为艺术家所钟爱，其原因盖出于此。艺术是以直觉去领悟人生的，因此伟大的艺术家的灵感发展到极高境界之际，确实是有可能获得某种超验感知的。如果这类神秘经验又是在对人生的极其丰富复杂的感受的基础上闪现的，就有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对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命运产生深远的洞察。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却正在这方面存在着缺陷。《围城》之中，始终贯穿着钱锺书极其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小说中的老学问家方遯翁遇到媳妇生孩子，便占个周易神卦以问吉凶，结果是毫无幽默感地失灵了。这个细节似乎颇有暗示意味，象征着这部小说是并不存在任何神灵或先知的。如果和前面已提到过的《红楼梦》作个比较的话，就更能看出《围城》的这种特点。由于曹雪芹怀着对人生神秘性的深刻感受，所以他的小说始终带着一种梦幻的色调，人物的命运犹如星空般地深邃难测；但说到钱锺书的《围城》，诚如该书之调侃鲍小姐之喜欢赤身露体：“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